

政治经济学的大历史观

顾海良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今天想讲的问题是有关政治经济学大历史观的问题，今年是2019年，160年前的1859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的时间。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上来看，这是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第一本系统阐释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以前有过《哲学的贫困》，也有过《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还有《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述，但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阐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第一本。现在已经过去160年了，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这本书除了对他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第一次作了完整的系统的阐释以外，对我们来讲，还有三个学术成就非常值得重视。

第一，马克思发布《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时候，写了一个《序言》。《序言》非常著名，之所以“著名”，还不是在政治经济学上，而是在唯物史观上。在《序言》中，马克思特意对唯物史观作了整体阐释，这对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非常重要。但还是应该看到，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开辟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新的理论天地，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式最重要的也是最显著的标志。

第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坚持了理论原理阐释与思想历史阐释的统一性。从第一分册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到，呈现的是“双重结构”：一方面是理论原理阐释，与此并行的另一方面是思想历史阐释。第一章“商品”在对商品理论原理阐释之后，有“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的思想历史阐释；在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对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以及货币作为货币的理论原理阐释之后，分别设了关于思想历史阐释的两个问题，即“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马克思把这三个思想历史阐释的内容，另外标了A、B、C的序号。把经济学理论原理阐述和思想历史阐释统一在一个结构体系中，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特征。

第三，怎样对待同马克思经济学异质的相对立的经济学问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概括，马克思是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法相对待的。马克思是以这样一种科学精神来对待他之前的，特别是对待他同时代的各种各样经济学理论和流派的。

这三个学术成就，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学术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发展和升华。

第一是历史观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显然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在1956年确立的。1956年初，毛泽东主席等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已经感觉到1956年我们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就开始思考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们现在仔细阅读毛泽东主席留下的文稿和他的谈话，可以看到，他当时已经提出社会主义要解决发展和解放社会生产力的主要问题。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同知识分子的一次谈话中，就讲了这个问题。他已经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还要解放社会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问题，生产力的发展要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成为毛泽东主席1956年谈话的核心内容。过了不久，他又加上一句，不仅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社会生产力，还要保护社会生产力，保护社会生产力就要调整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使之适合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就以生产力问题为逻辑起点，从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非常辩证地、通俗而简洁地作了表达。

我们回顾一下，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央政治局集体第一次学习的内容就是唯物史观。假如按照学哲学的顺序，可能是唯物论辩证法在前，然后再到唯物史观。但是，中央政治局集体第一次学习的内容是唯物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这次学习时，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做了系统阐释，讲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一系列辩证关系。最主要的是，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谈了很多新的见解。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由此而开始。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序言》的思想和学术成就得到了重要的体现。

第二个问题，经济思想历史阐释同经济理论原理阐释统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贯的思想。1899年，中国人在《大同学》中第一次看到马克思的名字。这时离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正好过了40年。后来，又过了50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就经济思想史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可以分为四个时间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6 年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于中国实际，创立了中国特色的过渡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过渡经济学、过渡理论的探索内容非常丰富。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过关于封建社会如何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问题的世界范围的讨论，现在更有以经济体制改革转型为主题的过渡经济学的探讨。我们在 1949 年到 1956 年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过渡经济学，至今成为很多研究中国道路学者探讨的重要问题，在一些国际研讨会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讨论。改革开放和中国过渡经济问题，1949 年到 1956 年和中国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关系？至今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二个时间段是从 1956 年开始，经过“文化大革命”，一直到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为止。这二十年，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有成功也有挫折，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还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有了多方面的发展。然后，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前，这就是第三个时间段。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形成和发展，形成的标志是 1984 年邓小平讲的，我认为写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新的发展时间段。

这一思想史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讲，经济思想史及经济史的研究，在理论经济学中，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如同“一体二翼”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应该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假如说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什么学术缺失的话，那么，最大的学术缺失就是没有历史的研究。特别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新中国经济史的发展，严重缺失。这样，对我们来讲，把我们以往理论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非常好的传统丢失了。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学习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学习，给我以极大的学术上的震撼，也给了我学术上的极大帮助。1984 年底到人民大学工作，人民大学理论经济学学科很强，给我印象深的，是我在人民大学经济学系重新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等课程。这两个历史研究的课程，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学的任何的理论创新，假如不知道经济思想史就等于零，它可以把自己的任何一个说法都说成“创新”和“填补空白”，而不知道思想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说法。前几天我在北大给本科生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就讲到 1956 年我们开始走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时候不要说飞机造不了，汽车我们也造不了，自行车我们也造不了，自行车有几个关键的小的零件我们做不了，这个

都要进口，这种经济状况下我们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可以开阔我们历史的眼界，使我们可以看到理论从何而来，我们的理论为什么那时候发展到这个程度。像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所讲的，我们对经济分析史的研究要了解过去的人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他为什么不能多走一步也没有少走一步？如果这个研究脱离历史，最坏的结果就是形成经济学研究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最近，听说中国人民大学把经济学院分成了理论经济学院和应用经济学院，这是非常好的消息，使得我们能够腾出手来用更大的力量把人民大学传统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发展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后面几代人，学习经济思想史用的都是鲁友章和李宗正先生主编的书。

第三个问题，如何对待同时代和以前的经济学家的理论的问题，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中极为关注的问题。1859年之后，又过了八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了。德文第一版几乎每一页都有注释，涉及许多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经济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的经济学家有近180位，其中，1823年李嘉图去世之后仍活跃于经济学界的有115位，占这些经济学家的66%，1843年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之后还活跃于经济学界的有94位，占这些经济学家的53%。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用专门章节批判主流经济学家理论的有两处。一是在第七章“剩余价值率”第3节“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中对西尼尔理论的批判。西尼尔是当时地位显赫的经济学家，他从1825年到1830年受聘于牛津大学首度设置的经济学教授席位，1847年到1852年再度受聘。二是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中对韦克菲尔德（1792—1862）理论的批判。《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韦克菲尔德条目中称：“在19世纪中间的三分之一时期内，他在古典经济学的年鉴中留下了鲜明的足迹。”对同时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亮剑”，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重要理论特色，也是马克思经济学起源的重要方面。

我们通常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源于对德国古典哲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一理解并不全面。马克思经济学还有一个重要起源，那就是马克思对他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现实经济问题与理论的探讨，直面资本主义现实经济问题。马克思从1843年经济学研究开始，一方面高度重视雇佣劳动和资本这一资本主义经济“轴心”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十分关注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现实问题的探讨。比如1848年初，马克思对英国刚废除谷物法后的自由贸易制度的走向十分重视，对自由贸易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的关系作了分析；1851年，马克思对当时英国银行学派和通货学派关于货币和信用制度问题的争论极为关心，他留下的《完成的货币体系》手

稿,对这一争论中价值、货币流通和信用制度对经济现实的关系问题作了剖析;1852年,马克思对法国正在发生的“股票投机”“实业投机”和金融危机问题非常留意,对法国和英国的信用制度及其机理作了探讨。出版于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涉及1865年英国工人工资状况问题、1866年爱尔兰农业平均产量问题、1867年英国工厂法扩充条例对使用童工的约束问题等。可见,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直面资本主义经济现实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学科学革命的重要基础。1850年到1853年和1857年到1870年,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较为集中的两个时间段。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著述,如配第的《赋税论》发表于1662年、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李嘉图的《赋税原理》发表于1817年,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时间段有着程度不同的距离。马克思经济学不只源自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也没有离开对同时代的主流经济学的探讨。马克思对英国的麦克库洛赫(1789—1864)和西尼尔(1790—1864)、德国的李斯特(1789—1846)、法国的巴师夏(1801—1850)、美国的凯里(1793—1879)等的著述和理论作过多方面的深入探讨。1857年,马克思在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时,曾打算从批判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学理论开始,因为马克思意识到,“他们两人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他们两人从事写作的民族环境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但却驱使他们产生了同样的意向”。^①马克思希望抓住主流经济学嬗变的基本取向和特征,通过对最为流行的经济学观点的批判,拓新自己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野。后来,马克思又从批判达里蒙(1819—1902)《论银行改革》的货币理论开始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马克思以达里蒙1856年出版的这一新著作为批判对象,也是希望能在对流行的经济学理论的直接回应中,形成自己的经济学体系。

我们讲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来源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马克思面对的是同时代的经济思想,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他那个时代的经济现实和经济学说来进行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不能单纯说是与古典经济学对话形成的,可能更要强调它是在对当时经济学理论的分析、研究、批判、借鉴中形成的。

马克思采取的批判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对马克思经济学之外的其他经济学学说,怎么才能够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是简单地批判、全部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弃、一个都不能用。任何经济思想的发展从来不会脱离同时代经济学说的发展，所以我们怎么对待马克思之外的其他经济学说？确实有一个“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过程。

今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发表 160 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们又在探讨新中国建立 70 年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我以上提到的三个学术问题，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这种思考是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